

# 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 三大转向及其整合的学理基础

张曙光

[提要]20世纪下半叶,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曾发生三大转向,即文化转向、进化转向、生态转向。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三大转向,并揭示它们可资以实现整合的学理基础,本研究首先对三大转向的发生脉络与逻辑,及其产物亦即新兴研究取向——主要指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相对于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的比较优势分别进行简要梳理;而后,基于元理论的视角,以“人的多重性存在”为逻辑起点,对三大转向赖以发生的底层逻辑的整合进行探析,由此建构出整合性元理论框架。该整合性元理论框架建基于,并表征着一种具有统摄性、包容性及辩证性的世界观或思维模式。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文化转向;进化转向;生态转向

中图分类号: B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21)05—021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道德行为的进化与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研究”(20&ZD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曙光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山西 太原 030006

## 一、引言

在经历二战洗礼之后,美国社会心理学——主要是指占据主导地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步入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发展期,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巅峰。然而好景不长,美国社会心理学便因积重难返而陷入危机——此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心理学危机”。作为这一危机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格根(Gergen, K. J)、莫斯科维奇(Moscovici, S)、桑普森(Sampson, E. E)等人批判指出,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去脉络化痼疾,即只见所谓“封闭自足”的个体,而不见个体所嵌入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这一痼疾的形成,源于研究者对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研究科学观——亦即强调事实与真理具有抽象性、一般性、普适性或超社会历史性的一种研究范式——的执迷<sup>[1][2][3]</sup>。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桑普森、格根等,还关注到了历史主义科学观——亦即强调事实与真理具有具体性、情景性及特殊性,或者说是嵌入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研究范式——及其相对于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研究科学观的先进性,并由此力推范式转向,以期化解上述痼疾,从而使社会心理学能够反映更广泛的人类价值观,提供更为整全的

人类社会行为研究视角<sup>[3][4][5]</sup>。为方便表述,桑普森(Sampson, 1978)曾以“范式I”(Paradigm I,可简缩为“P<sub>I</sub>”)指称上述前一种范式,以“范式II”(Paradigm II,可简缩为“P<sub>II</sub>”)指称上述后一种范式<sup>[3]</sup>。

正是在以格根、莫斯科维奇、桑普森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当代社会心理学才得以发生以脉络化研究取向的兴起为表征的由P<sub>I</sub>到P<sub>II</sub>的研究范式转向。关于这一事实,有四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发生不是单个研究者努力的结果,而是学术共同体对旧有以“封闭的人”为基本预设的去脉络化的主导性研究取向(以下简称“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进行集体反思与重构的结果<sup>[6]</sup>;第二,由于“人”存在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学科交叉性决定智识来源的多样性)、社会心理学知识生产的集体建构性(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往往倾向于倚重不同的智识来源)等因素使然,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必然呈现出多种新兴研究取向同途异辙的景象;第三,“脉络化研究取向”实际上是对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中涌现出的多种

新兴研究取向的统称,粗略地讲,新兴研究取向主要有三个,即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及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其兴起分别表征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进化转向和生态转向,即本文所谓的“三大转向”;第四,研究范式的建构及重构亦即“转向”均必然建基于特定元理论,由此联系第三点来看,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或者说,在多元脉络化研究取向兴起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心理学元理论的多元化发展。然而,从相关学术论文的刊发情况来看,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转向在国内社会心理学界关注较少<sup>[7][8][9]</sup>,更乏提及整合。

当前新文科建设业已进入全面部署的新阶段,它理应直面、聚焦并服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大变革<sup>[10]</sup>。社会心理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性地位,其视角对于社会大变革研究也具有不可或缺性,研究范式的转向对于本学科与相关相邻学科的交叉融汇具有表征性,因此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转向,揭明它们可资以实现整合的学理基础,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深化新文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有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对三大转向的发生脉络与逻辑,以及其产物——新兴研究取向——相对于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的比较优势分别进行简要梳理;而后,基于元理论视角,以“人的多重性存在”为逻辑起点,对三大转向可资以实现整合的学理基础进一步加以分析。

## 二、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三大转向简梳

### (一) 文化转向

心理学始终具有文化性<sup>[10][11]</sup>。然而,历代心理学家对此并不总是有清醒的认识,而大致会经历一个由“发现”到“无视”再到“发现”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即与当代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的文化性,或者更深一步讲,是“心理”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依存性的再发现有关。此处“心理”即是指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模式,而“社会文化”(The sociocultural)即是指社会世界中的共享意义(包括观念、表征、态度、价值观、基模、刻板印象等)、文化产品、人际互动模式、制度性实践与系统,以及“人-情景依随性”(person-situation contingencies)<sup>[12] P.5</sup>。

事实上,在心理学学科创建过程中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冯特(Wilhelm Wundt)、鲍尔温(James Mark Baldwin)、詹尼特(Pierre Janet)、维果

斯基(Lev Vygotsky)、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心理学家均不同程度地强调“心理”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依存性,并力主以此为预设来开展研究,该取向亦可称为“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然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出于提升与维系学科自信——即学科的科学可信性——的需要,大多数心理学家都颇为崇信客观主义知识论、操作化定义及量化测量,以致使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难以见容<sup>[13]</sup>。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及进化文化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才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文化与心理呈相互建构的关系;社会文化生产与共享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也是人类种系所拥有的一种进化优势<sup>[12]</sup>;心理学中的主流理论框架之所以对愈来愈多的实证研究结果缺乏解释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要么无视“社会文化”的存在及其对“心理”的影响,要么偏颇地将“社会文化”视作一种与“心理”相割裂的背景性存在,并强调“社会文化”对“心理”的单向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精于对“社会文化”与“心理”的概念化。这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的发生,或者说,是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的复兴,其背后的逻辑是:人是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的非中性化存在,心理与行为的源头不仅内在于人的大脑,还外在于世界(亦即社会文化)<sup>[12] P.5</sup>;如欲全面透彻地认识和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则还须重新确立后一源头在理论认识中的地位,并将两个源头之间的互动关联纳入研究视域。

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认为,社会文化系由人先前的心理活动积淀而成,它反过来又更多地进行新的构成,而不只是影响人的心理倾向;社会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建构总是发生在日常生活情景之中<sup>[12]</sup>。该取向力图揭示“潜隐在深为文化所模塑的社会性及心理多样性背后的系统原理”,描述“所有人类被建构为基本意义上的社会人的过程”,其中所涉及到的社会文化分析旨在对人所嵌入的情景做更多的探析,以期增进心理学对于“人在维系影响其自身(心理与行为)的情景中的作用”的认识<sup>[12] P.7,10</sup>。相对于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而言,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从根本上消解人与情景、个体与(社会文化)环境、

自我与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消弭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及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鸿沟。

## (二) 进化转向

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进化转向与进化心理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兴起有关。究其实质,进化心理学的兴起就是一场心理学家面对进化生物学的迅猛发展给既有知识体系与思维模式带来冲击与挑战,回归本能心理学传统,并藉由现代心理学(确切地说,是认知主义心理学)与现代进化生物学的有机整合来谋求心理学的合法性地位的振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巴斯、辛普森(Simpson J. A)与肯里克(Kenrick, D. T)等进化心理学家深刻认识到进化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可以相互沟通、互为借鉴,进而推动两学科的横向联合。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进化转向的发生,或者说是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确立,即是以此为背景的。至于其背后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 进化心理学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心理学。人类种系在其进化过程中所面对的诸多适应问题皆具有社会性,以致其经由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大多专司社会性问题解决<sup>[14]</sup>。

2. 进化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彼此兼容为前提的互补、互惠、互依关系。具体而言,进化心理学溯流追源,能够解释对社会心理学研究至关重要,但却并不为其所涉及的心理机制的起源与功能,从而使社会心理学避免给出谬论或片面之言;社会心理学能够以其既有的深厚积淀帮助进化心理学研究者更好地认识与把握研究中绕不开的诸多面相,例如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及专司社会信息处理的精细心理装置、情境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sup>[15][16]</sup>。

3. 进化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的渗透与滋育,可助其克服部分不足。作为一种元理论,进化心理学能够通过提供具有统摄性的理论框架来整合横跨不同领域,看似彼此独立无关的、碎片化的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结果,并指导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假设,由此帮助其走出“间歇性‘信心危机’”,同时也使社会心理学一改“过于迟缓的‘累积性特征’”<sup>[16](P. ix)</sup>。

简言之,进化社会心理学实际上是一种建基于“心理机制的信息加工适应模型”,并因此得以兼顾“近端导因”(proximate causation)、“个体发

生”(ontogeny)与“终极导因”(ultimate causation)等三个分析水平的研究取向<sup>[14][16](P. 14-15)</sup>。该研究取向强调和关注个体与情境的相互作用,并偏于研究和探讨其赖以促发特定行为的中介过程<sup>[17]</sup>。与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相比,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具有支持探源索隐、推动学科内部整合、促进学科积累等优势。

## (三) 生态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生态转向,源于“生态化传统”这一心理学学术传统的复兴。生态化传统格外强调和关注环境因素之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它在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多个分支领域中均有渗透。历史地看,生态化传统肇始于 20 世纪 10 年代,并在 10-40 年代间得到了充分发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生态化传统在 50-60 年代曾一度中断,直到 70 年代以后,才随着生态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社区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及文化心理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逐渐得到复兴。作为一种根植生态化学术传统,且涵盖多个分析水平的新兴研究视角,“社会生态视角”由此在心理学理论建构及研究实践中日渐凸显出来。与之相应,“社会生态心理学”(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作为一种基于社会生态视角的新兴研究取向,也随之日益受到关注<sup>[18]</sup>。

具体而言,所谓“社会生态”是指人们所嵌身的“物理、社会与人际环境”,其中既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教育系统、社会与组织奖励系统、宗教系统、人口结构、地理、气候等宏观因素,也包括区域(例如城市、城镇与邻里等)特征、住房、家庭与亲属关系等中观因素。“社会生态心理学”重在探究物理、社会及人际环境何以影响个体与群体的认知、情感与行动,以及这些认知、情感与行动反过来何以建构物理、社会及人际环境<sup>[17]</sup>。至于“社会生态心理学”这一新兴研究取向得以确立,或者说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生态转向”得以发生的逻辑,可以简要概括为:人始终嵌身于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之中,并与之发生着相互作用。

客观地讲,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的采用能够极大地开阔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使其在理论思考方面更为大胆开放,或者更进一步地促动研究者在理性认识层面跳脱出“私人(生活)轨道”或“近身环境”的局限<sup>[19](P. 3)</sup>,关注到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与客观物理环境,以及日常惯有情景,进而发挥出“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

tion)<sup>[17]</sup>。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指一种能够使人深刻地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这两者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的“心智品质”或“视角转换能力”<sup>[19](P.57)</sup>。正如大石、克斯比及斯奈德(Oishi S, Kesebir S & Snyder B. H)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分析优势相结合,可以极为显著地拓展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域,从而使社会心理学真正成为勒温(Lewin K)与卡特赖特(Cartwright D)等社会心理学家所设想的“社会科学的大分支”<sup>[20]</sup>。由此认为,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相对于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的核心优势,即在于解放学术想象力,开阔学术视野。

总的来看,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与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心理学取向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其中,相同之处在于三者均倾向于以“开放的人”为基本预设<sup>[6]</sup>,强调和关注宏观、中观环境因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相异之处在于,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重在探究客观宏大环境(既包括现有环境,也包括旧有环境)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相互作用,文化心理学取向重在探究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建构,进化心理学取向重在探究人类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在人类祖先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及演变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与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心理学取向等新兴心理学研究取向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也因此而能够成为融通文化视角和进化视角的纽带。此系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相对于旧有主导性研究取向的另一重要优势,该优势实际上是由核心优势衍生而来的。

近年来涌现出的诸多具有跨学科性的心理学研究,颇能佐证上述这一优势的存在。例如,尼斯贝特(Nisbett R. E)与科恩(Cohen D)在综合采用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与文化心理学取向的研究中,以其所收集到的(个体水平的)实验与调查数据、区域性犯罪与刑罚统计数据及相关法律条款、见诸报端的案例故事,揭示了美国南部地区民众所共享的讲求刚强不屈、自我防卫、以暴制暴的社会文化,并以移民史、生计模式及经济社会转型等远端宏大环境因素有效地解释了这一文化何以发生与维系的<sup>[21]</sup>;又如,塞迪基德斯(Sedikides C)与斯克朗斯基(Skowronski J. J)在综合采用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与进化心理学取向的研究中,探

讨了人类种系所特有的“符号自我”(symbolic self)是如何在其积极适应生态压力与社会压力的过程中乘法衍化出来的<sup>[22]</sup>;再如,康格斯特(Gangestad S. W)、哈兹尔顿(Haselton M. G)与巴斯(Buss D. M)在以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融通文化视角和进化视角的研究中,以“唤起的文化”(evoked culture)概念为中心,构建出了可用于预测和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对择偶偏好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探析<sup>[23]</sup>。

### 三、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三大转向的整合机理探析

基于元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及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三种具体产物,无不以人的多重性存在为逻辑起点。所谓“人的多重性存在”主要包括生物性存在(可分为个体与种系两个水平)、生态性存在、心理性存在、文化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包括政治与经济两个面相)及历史性存在等面相,为方便表述,以下将这些面相分别简称为“生物”“生态”“心理”“文化”“社会”及“历史”。鉴于“社会”“文化”与“历史”互为一体,不可分割,故将三者合并表示为“社会-文化-历史”。

由于“人的多重性存在”这一逻辑起点的引入使然,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与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无不将人所嵌入的脉络——包括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等——及其与人的心理的互动关联纳入研究视域。但是,它们各有偏重: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偏于聚焦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心理的相互建构;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偏于聚焦人类祖先所生活的生态环境及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理产生的影响;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偏于聚焦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政治与经济环境)与人类心理及行为的相互作用。

基于前文所作梳理与分析来看,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主要以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心理的相互建构为焦点,并因此涵摄了“心理”“社会”“文化”及“历史”等多个存在面相的元理论;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主要以人类心理机制的发生为焦点,并因此涵摄了“心理”“生物”“生态”“社会”及“历史”等多个存在面相的元理论;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则主要以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类心理的相互作用为焦点,并因此涵摄了“心理”“生态”“社

会”及“历史”等存在面相的元理论。由此,不难管窥到潜隐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元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与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心理学取向三者的兼容性与互补性,昭示着其元理论具有巨大的整合潜力。有鉴于此,特尝试以元理论为切入点,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转向,或者确切地说,是对上述三种新兴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何以实现整合的学理基础进行探析。在展开探析之前,有必要先厘清“生物”“生态”“心理”“文化”“社会”及“历史”等存在面相的具体内涵,以及其彼此之间的关联。

联系既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生物”是指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面相:人不仅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还能够藉由优胜劣汰的遗传机制实现相关基因的代际传递,从而最大程度地确保或提高下一代的生存适应性。“生态”是指人作为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的存在面相:人与生态系统的其它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存在所具有的二重性——生物性与社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必然耦合成复合型系统<sup>[24]</sup>;“心理”是指人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者与建构者的存在面相:人能够基于经由种系进化形成的以神经回路为物质基础、以管理来自生存环境(包括社会情景)中的机会与威胁(被称为“可供性” affordance)为主要功能的心理机制,并将知觉刺激,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藉由感官所接收到的一小部分特定信息转换成关乎着适合度的分类推断,进而激活与“可供性”相关联的认知、情感(绪)及行为倾向<sup>[14][17][P.766]</sup>;“社会”是指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面相<sup>[25][P.56]</sup>,该面相与人类种系所进化出的超社会性密切相关:人与人相互依赖、互为依存,彼此之间各种各样的直接或间接联结,共同构成具有超个体性、结构性、隐形性与流变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反过来深受其影响<sup>[26]</sup>;“文化”是指人作为创造与学习共同体的存在面相:人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实现内部整合、建构共享意义(包括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各种客体之于自身的意义等),群体性地建构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及主观文化,它们反过来又形塑了人的“心理”<sup>[27]</sup>;“历史”是指人具有时序特定性的存在面相:每一代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之中”,“而这个历程又存在于某个历史序列之中”<sup>[19][P.6]</sup>,其生命历程也必然因此与社会历史进程有所交织

和互动。由此联系前文所作梳理,以及其它相关研究成果,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五点:

1. “生物”“生态”“心理”“社会”“文化”及“历史”等存在面相彼此关联,互为依存,相互渗透。对于人而言,“生物”和“心理”属于本体,“生态”“社会”“文化”及“历史”皆属于脉络。鉴于“生物”自成一体,且主要是以遗传为其运作机制,该运作机制以基因为基本单位,故亦可将之表示为“生物-基因-遗传”。

2. “生物-基因-遗传”与“社会-文化-历史”均既可以指一种状态,也可以指一种进程。其中,作为进程的“生物-基因-遗传”主要是指种系进化,而作为进程的“社会-文化-历史”主要是指社会变迁。这两者必定是沿着时间而展开的,换言之,“生物”与“社会-文化”均具有时间嵌入性,但两者在这一点上又有不同: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生物”所嵌入的时间已成“过去时”——人类种系进化史,其间那些帮助人类祖先成功地解决了其在狩猎-采集时代所遇到的攸关生存和繁殖的日常适应问题,例如躲避敌害与寄生虫、择偶、采集植物果实、与朋友协商、应对社会冲突、抵御外来入侵、养育孩子、寻找理想的居所等,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其直接或间接繁殖成功率的基本心理机制,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被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来<sup>[14]</sup>;从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所嵌入的时间可谓“进行时”,它们在与以上述基本心理机制为内核的“心理”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迁,由此构成连绵不断的历史。当然,这一复杂的动态非线性过程往往因个体或群体所嵌入的历史序列即通常所说的“世代”,以及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3. “生态”与“生物-基因-遗传”、“社会-文化-历史”三者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或者说是人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的。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心理”的发生是以“生物进化”——亦即“生物-基因-遗传”——为基础的<sup>[28]</sup>,它因此具有二重性,即预置性与开放性,诚如预先内置了诸多限定,但同时却又为外部环境输入留出了大量空间的“涂色书”(coloring book)<sup>[29][P.269]</sup>。“心理”的预置性体现在诸多面相,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面相是“能动性”(agency),即人类所拥有的影响其“思维过程、动机与行动”,进而影响其所卷入的“事件进程”的能力<sup>[30][31][P.8]</sup>。由于其所具有的

二重性使然,“心理”一方面为同为环境因素的“生态”与“社会-文化-历史”所形塑,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作用于“生态”,且同时构成“社会-文化-历史”建构的基础<sup>[18][28]</sup>。

4. 人的存在兼具三个特性,即“类特性”、“个体性”与“群体性”<sup>[32]</sup>,它们分别与人性、人格与文化紧密相联。粗略地讲,“心理”与“生物-基因-遗传”的联结所折射出的更多是“类特性”,“心理”与“生态”的联结所折射出的更多是“群体性”,“心理”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结所折射出的更多是“个体性”和“群体性”。当然,这一分析“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脱离群体性的类特性和个体性、脱离类特性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也不存在脱离个体性的类特性和群体性,三者相互作用共同融合在个人的心理-行为之中”<sup>[32]</sup>。

5. 作为联系“生态”、“生物-基因-遗传”及“社会-文化-历史”三者的枢纽,“心理”不可能超越社会情景而存在,毕竟人总是嵌入在社会情景之中的,而且其本身对社会情景具有经由种系进化而来的易受性与反应性<sup>[33]</sup>。人对社会情景的易受性与反应性,实际上可视为“心理”的预置性的一种体现。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卡尔(Carr, L. J)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情景”作为一种具有涌现性的“型构”(configuration),主要是由“人”(对于其中任一个体而言,他人的在场既可以是真实性的,也可以是想象性的,还可以是隐含性的)、“文化特质”、“特定意义与关系”、“动态过程”、“特定时间”及“特定场合”等因素构成的<sup>[34]</sup>。更进一步讲,“社会情景”本质上是人类个体在特定时空下,在人类种系所进化出的诸如追求共识、控制感、归属感、自我价值感,以及信任他人等核心社会动机的促动下,与切身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的多重性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情景”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的一面,前者指“社会情景”部分是由客观存在着的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等构成的;后者指“社会情景”部分是由主观存在着的人的“知觉建构”(Perceptual construction)等构成的,通常来说,人通过“知觉建构”赋予其所感知到的世界以“结构、稳定性与意义”<sup>[33][P. 85]</sup>。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其所嵌入的“社会-文化-历史”——包括出生世代、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文化等方面——不尽相同,构成同一情景的不同个体的“知觉建构”时常互有出入,并由此引发冲撞与

协商,进而从微观层面推动“社会-文化-历史”不断发生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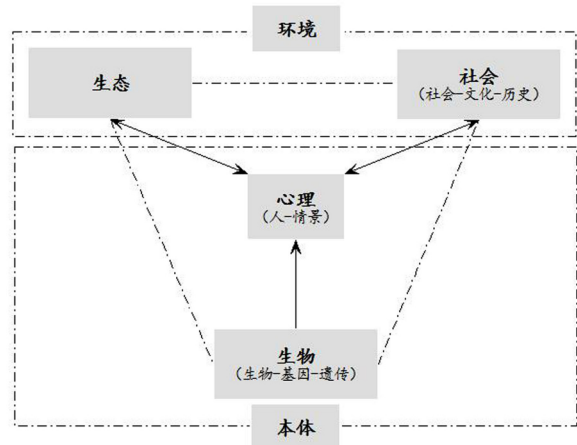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性元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探析,可以勾勒出一个整合性元理论框架(参见上图),以此表征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转向可资以实现整合的学理基础。换个角度来看,该整合性元理论框架所刻画的实际是一种具有统摄性、包容性及辩证性的世界观或思维模式,其最大特点是以人的多重性存在为逻辑起点,兼顾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进而从根本上克服了先天与后天、人与情景、个体与(社会文化)环境、自我与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惟有确立这样一种世界观或思维模式,社会心理学研究才有可能彻底走出“去脉络化危机”。

#### 四、结语

纵观整个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主张以整体观视角来研究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过,但直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危机发生之后,它才变得愈来愈强烈,从而最终冲破力主以还原论视角来研究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主流声音的遮盖。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转向的相继发生即是明证,其产物——社会文化心理学取向、进化社会心理学取向与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均可视作社会心理学家为推动主张以整体观视角来研究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呼声落地生根,而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以整合性元理论框架的构建为前提和基础,可以对这些解决方案做进一步优化整合,从而提出更具辩证性、融通性、统摄性、洽合性的解决方案。

无论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转向,还是此三大转向的整合,都极其符合英国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贝特森(Bateson, G)在其对“心灵

是什么”“世界何以在心灵层面上联结在一起”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力倡的理性发展方向:以跨学科融汇贯通为支撑,摒弃单一的、封闭的、割裂的思维模式,并替代以多元的、开放的、联结的思维模式<sup>[35]</sup>。当然,有关三大转向整合方面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可以确定的是,后续的探讨终究还是要以人的多重性存在为逻辑起点,而且无法绕开“世界何以透过个体(心理)与情景的相互作用,或者更深一步说,是在两者之间起着联结作用的自我的适应与建构,在心理层面上联结在一起”这一核心问题。

### 参考文献:

- [1] Gergen K. J. 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3, 26.
- [2] Moscovici S. Society an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A] // Israel J & Tafjel H. (eds).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A critical assessment*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 [3] Sampson J. E. E. Scientific paradigms and social values: Wanted -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36.
- [4] Gergen K. J. *Toward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knowledge* [M]. New York: Springer - Verlag, 1982.
- [5] Gergen K. J. & Morawski J. An alternative metatheory for social psychology [J].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1.
- [6] 张曙光. 社会心理学中的人: 两种基本人观模型的认识论基础及其演替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
- [7] 冀东徽, 石敏, 赵然, 刘肖岑. 社会生态心理学: 探究个体与环境关系的新取向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
- [8] 马广海. 文化研究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4).
- [9] 朱新秤, 焦书兰. 进化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2).
- [10] 孟维杰, 葛鲁嘉. 论心理学文化品性 [J]. *心理科学*, 2008 (1).
- [11] Miller J. G. Cultural Psychology: Implications for Basic Psychological Theory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9, 10.
- [12] Markus H. R & Hamedani M. G.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The Dynamic Interdependence among Self Systems and Social Systems [A] // Kitayama S & Cohen D.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C].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7.
- [13] Kirschner S. R & Martin J. The Sociocultural Turn in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nd an Invitation [A] // Kirschner S. R & Martin J. (Eds). *The Sociocultural Turn in Psychology: The Contextual Emergence of Mind and Self* [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4] Buss D. 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5th ed.) [M].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015.
- [15] Buss David M.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Prospects and Pitfalls* [J].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990, 14 (4).
- [16] Simpson J. A. & Kenrick D. T. Preface [A] // Simpson J. A. & Kenrick D. T. (Eds).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 [17] Neuberg S. L., Kenrick D. T. & Schaller M.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A] // Fiske S. T., Gilbert D. & Lindzey G.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0.
- [18] Oishi S & Graham J. Social Ecology: Lost and Found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5 (4).
- [19] Mills C. 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2000.
- [20] Oishi S, Kesebir S & Snyder B. H. Sociology: A Lost Conne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9, 13 (4).
- [21] Nisbett R. E. & Cohen D. *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 [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22] Sedikides C. & Skowronski J. J. The Symbolic Self in Evolutionary Context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997, 1.
- [23] Gangestad S. W., Haselton M. G. & Buss D. M.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Variation: Evoked Culture and Mate Preferences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6, 17 (2).
- [24] 孙桂娟, 叶峻. 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解析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8 (3).
- [25]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A] //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6] Sztompka P. *Society in Action: The Theory of Social Becoming*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27] Chiu C. Y., & Hong Y. Y.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 [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6.
- [28] Barkow J. H. Beneath New Culture is Old Psychology: Gossip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 Barkow G., Cosmides L &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9] Kenrick D. T., Nieuweboer S & Buunk A. P. Universal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Replacing the blank slate with a coloring book [A] // M. Schaller S, Heine A, Norenzayan T, Yamagishi and T. Kameda. (Eds). *Evolution, Culture and the Human Mind* [C].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0.
- [30] Bandura A. 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9).
- [31] Bandura A. Affirmative Action: Implications For Adults [A] // Carr Deborah 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Detroit, 2009.
- [32] 沈建国. 个人: 类特性、群体性、个体性的统一 [J]. *学海*, 1993 (3).
- [33] Fiske S. T. *Social Beings: Core Motives in Social Psychology* [M]. Hoboken NJ: Wiley, 2014.
- [34] Carr L J. *Situational Sociolog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5, 51 (2).
- [35] [美] 贝特森 B. 心灵与自然: 应然的合一 [M]. 钱旭鸯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收稿日期 2021-03-01 责任编辑 程融